

## 从《喜福会》中的语码选择看美国华裔移民的语言态度

陈春华, 胡亚敏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英语系, 河南洛阳 471003)

**摘要:** 美国华裔小说《喜福会》在描写华裔社群的日常会话时, 出现了不少语码转换的情形。对话语码转换和语码选择的研究可以看出, 华裔社群中的第一代与第二代移民对待中英文的态度存在不小差异。在不同态度的背后是两代人对各自社会身份的不同认知。

**关键词:** 《喜福会》; 语码转换; 语言态度; 社会身份; 标记模式

《喜福会》是美国华裔作家谭恩美 (Amy Tan, 1952 - ) 的第一部作品。小说通过四位华裔母亲及其女儿们的叙述, 反映了美国华人家庭中的代沟, 尤其是第一代和第二代移民对待她们文化身份的不同态度。第一代移民 (母亲们) 依恋本民族的特有文化; 第二代移民 (女儿们) 则嘲笑并摒弃母亲所代表的弱势文化, 更多地接受了美国主流社会所代表的强势文化。两代移民在使用中英文时表现出不同的态度, 也反映了他们对文化身份的不同认知。文章将就小说中出现语码转换和语码选择的情形进行分析, 进而研究它们的社会语用含义。

### 1. 语码转换研究回顾

#### 1.1 语码转换的定义

同一话语中不同的语码选择导致语码转换的出现。关于语码转换 (Code-Switching, 简称为 CS) 的定义, 研究者往往根据各自的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给出不同的定义。首先是对语码的定义。语码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定义认为语码可以是语言、方言、甚至是相同语言的不同风格。狭义定义仅把不同语言定义为语码。其次, 语码转换本身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定义认为语码转换通常涉及到较长文本或话语, 通常是句子。有人将此称为句间语码转换。广义定义不仅包含句间语码转换, 还包括句内语码转换, 如语码混用 (code-mixing)。很多学者认为在研究语码转换的功能和社会心理意义时没有必要区分句间与句内语码转换。本文主要探讨语码转换的功能及社会意义, 因此将采用语码的狭义定义以及语码转换的广义定义。

#### 1.2 语码转换研究回顾

对话语码转换的研究自上世纪七十年代逐渐发展起来, 到今天已经发展成社会语言学中研究最为深入的领域之一。J. Fishman、Gumperz (1982) 等早期研究为语码转换研究带来了活力。上世纪 80 和 90 年代是语码转换研究的黄金时期, 涌现出不少重要论著和理论模型。Muysken (1984)、Myers-Scotton (1993a, 1993b) 以及 LI (1994) 等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语码转换研究也从早期的社会语言学研究开始向多纬度发展, 包括社会心理学、语用学、句法学等角度的研究, 并取得了较大进展。本文主要讨论语码转换的社会语用研究模式。

Myers-Scotton (1993) 将她的标记模式 (the markedness model) 与另外两种社会语用理论模式对立起来: 域模型 (domain model) 以及互动或描述模型 (interactional/interpretive model)。域模型主要源于 J. Fishman

#### 【作者简介】

陈春华 (1974-), 博士研究生,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英语系讲师; 研究方向: 社会语言学、语用学、外语教学。

胡亚敏 (1972-), 博士,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副教授; 研究方向: 美国战争小说、华裔文学、黑人文学。

的理论。该模式认为在双语或多语情景下,各语言使用的情景不同,在特定情景下通常只能选择一种语言,各种语言或方言的分工明确,因此也被称为一种语言分配模式(allocation paradigm)。互动或描述模型的理论源自J. Gumperz的互动交际理论。互动或描述模型将语码转换视作一种“语境化线索”(contextualization cue),是Gumperz定义的话语策略的一种。Myers-Scotton(1993)认为上述两种理论均有缺陷。在双语或多语情景下,语码转换的出现并不总是伴随参与者、言语情景等的变化,域理论无法解释这些情形。而互动或描述模型过多地强调从当前语境中寻找语码转换的社会语用动机,从而无法宏观地解释为何言语社群对相似情景中的语码选择有着相似的认识。

Myers-Scotton(1993)认为标记模式可以很好地将上述两种模型结合起来,从宏观和微观角度均可解释语码转换现象。模仿Grice的会话合作原则,作者提出了语码转换现象中的“协商原则”(negotiation principle):“选择你会话参与的形式,标记(index)你欲在当前会话中说话人和受话人之间产生的权利和义务集”(Myers-Scotton, 1993, p. 113)。

“协商原则”下辖三个准则:无标记选择准则(unmarked-choice maxim);有标记选择准则(marked-choice maxim);试探性准则(exploratory-choice maxim)。在遵循这些准则的过程中出现语码转换的四种类型:(1)语码转换为无标记选择的序列;(2)语码转换本身为无标记选择;(3)语码转换为有标记选择;(4)语码转换为试探性选择(Myers-Scotton, 1993, pp. 113-114)。

首先,交际中随着情景因素的变化,通常会出现语码转换的无标记选择的序列。此时,说话人意欲重新选择无标记的权利义务集,以便与新的情景因素相适应。在语码转换本身为无标记选择的情形下,说话人试图表现自己同时具有的两种不同身份,或对交际的两种态度。此时,某个具体的语码转换并没有特别的标示作用,而是语码转换的整体交际模式本身承载了交际意图。如果语码转换是有标记的选择,则表示说话人希望使交际双方的社会距离发生变化,或加大,或缩小。而试探性语码转换发生于说话人对交际情景、参与者之间关系把握不大的情况下,语码选择成为确定社会距离的一种尝试性手段。

除了标记模式,Giles等的“适应论”(Speech Accommodation Theory)以及Le Page等的“身份行为理论”(Identity Act Theory)也被用来解释语码转换现象,本文将在后面的章节有所论述。

## 2. 《喜福会》中的语码选择

### 2.1 语码转换的实例分析

由于《喜福会》描述的是美国华裔移民的生活,因而文本中出现一些语码转换的情形<sup>1</sup>。第一代移民和第二代移民由于语言能力以及语言态度不同,语码转换主要出现在前者身上,主要表现为在描述或对话中加入汉语词汇以及表达方式。其中,词汇的借用占了相对大的比例,尤其是一些不太容易用英语表达的词,如:

例1 My auntie, who had a very bad temper with children, told him he had no *shou*, no respect for ancestors or family, just like our mother. (孝)(35)<sup>2</sup>

例2 “A mother is best. A mother knows what is inside you.” She said above the singing voices. “A psychiatrist will only make you *hulihudu*, make you see *heimongmong*.” (糊里糊涂;黑朦朦)(210)

以例2为例,在美国出生长大的女儿婚姻出现危机时,首先想到的是去找心理医生咨询,却没有向母亲请教。这时,母亲告诉女儿,知女莫如母,母亲对女儿的心思了解得最清楚,而心理医生只会使得女儿更加没有主张。在对女儿表达此观点时,母亲特意在英文中夹杂了两个中文短语:糊里糊涂、黑朦朦。此时的语码转换一方面是因为母亲难以找到贴切的英文对应词,另一方面母亲想对女儿强调,传统中国文化

<sup>1</sup> 我们这里的语码转换不仅指会话中的语码转换,也指文本中的语码转换。我们认为文本中的语码转换很好地模拟了交际场景。

<sup>2</sup> 文中所有仅标有阿拉伯数字的引用均来自Tan(1989)。例中的斜体为原文如此。

中的母女情能比美国式的心理医生更好地帮助女儿解决当前面临的心理危机。可见，此时的语码转换生动表现了母亲对传统中国文化的青睐。

小说中还有其它类似的例子：*ni*（逆），*chaswei*（杂碎），*Chunwang chihan*（唇亡齿寒），*Syi Wang Mu*（西王母），*yi tai*（姨太），*syaumei*（烧卖），*ywansyau*（元宵），*tyandi*（天地）等。这些词汇主要涉及中国文化中特有的成分。第一代移民难以从英语中找到对应的语言，加上对中国文化的依恋，自然选择了汉语。

小说也较多使用了英语中有很好对应词的汉语字词。这主要是考虑实际对话中的语言选择。如：

例 3 “*Ni kan*,”... “You already know how. Don’t need talent for crying!”（你看）（142）

例 4 “*O! Hwai dungsyi*” — You bad little thing—.... “Is Buddha teaching you to laugh for no reason?（坏东西）（239）

例 5 “He is American,”... “A *Waigoren*.”（外国人）（124）

在例 5 中，作为第二代移民的女儿喜欢与美国男孩交朋友，而不愿与有中国血统的男孩来往。这时，母亲大声警告女儿：“他是美国人，一个外国人。”母亲在话语中用中文强调其男朋友是外国人这一事实，一方面表达了母亲的震惊，震惊于女儿居然会与外国人、美国人谈恋爱，另一方面是提醒女儿他是外国人这一显然的事实。然而，女儿却针锋相对：“我也是美国人。”（124）这一对话生动反映了母女二人对自身的文化定位：母亲认为自己和女儿都是中国人，而女儿却坚持自己是美国人。这种对文化身份不同的认知直接导致了中英文的语码转换更多地出现在母亲身上。对话中的语码转换形象地表现了母亲代表的传统中国文化与女儿代表的美国文化之间的冲突。

这种在实际会话中的语码转换还包括：*chabudwo*（差不多），*butong*（不同），*dyansyin*（点心），*nuyer*（女儿），*ching*（请），*pichi*（脾气），*Mei gwansyi*（没关系），*nengkan*（能干），*yiding*（一定），*Swanle*（算了），*Syaujye*（小姐），*lihai*（厉害）等。它们主要出现在第一代移民与第二代移民的对话中，而使用这些汉语词汇的大多数也是第一代移民。

另外，小说中也不乏汉语整句，虽然都不长，但都是完整意义上的句子。如：

例 6 “*Shemma bend ren!*” — What kind of fool are you?（什么笨人）（50）

例 7 “*Syin yifu! Yidafadwo!*” — Your new clothes! Everything, all over the place!（新衣服！一塌糊涂）（70）

例 8 “*Shemma yisz?*” — What meaning? — She asked me...（什么意思）（109）

例 9 “*Dangsyng tamende shenti*,” which means “Take care of them”...（当心他们的身体）（130）

例 8 很有趣。母亲在杂货店打开一瓶罐头，放在鼻子下闻。杂货店老板愤怒地对她大声叫喊。母亲没有听懂，转用中文问身边的女儿：“什么意思？”在美国文化中长大的女儿为母亲这种不礼貌的行为感到十分难为情，但她深知母亲会认为自己的行为无可指责。为了避免争吵，女儿只能告诉她老板说的是中国人不能在此购物。母亲的语码转换表现了她对自己的行为方式给美国人造成的不良印象完全浑然不觉，她丝毫没有意识到美国行为方式与传统的中国行为方式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女儿对该事件的敏感也生动反映了她作为第二代移民在美国社会的尴尬，因为两种文化的冲突让她感到无所适从。

## 2.2 语码选择

除了语码转换的应用外，小说在很多地方对移民的语言选择特别进行了说明。首先，第一代移民（主要指母亲们）在讲述自己的经历时通常使用中文。向女儿讲述中国的传说故事时，许安梅总是选择汉语（207）。向吴精美讲述她刚去世的母亲在中国逃难的经历时，映映阿姨用英语开始，但很快就改用汉语（29）。吴精美在请父亲讲去世母亲的故事时，特意让父亲使用中文（323）。在日常生活中，尤其是母女有冲突时，母亲也总是选择中文。吴素云对女儿发脾气时总是使用中文（146，152）。映映·圣克莱尔在发脾气时也是如此（105）。而女儿们虽然能听懂中文，但更多使用英语回答。

由于英语是主流社会的语言，第一代移民也不时使用英语。如在打麻将时，他们就在汉语中夹杂一些

蹩脚的英语(23-24)。映映·圣克莱尔与其不懂汉语的美国白人丈夫交流时,只能用英语。所描述的四位第一代移民妇女因语言能力原因讲英语较少。然而,如果两名华裔由于其汉语方言的差异不能相互理解,也会选择并不流利的英语进行交流。在家庭场景以及华裔社交圈之外,她们也只能选择自己并不擅长的英语。

当然,语码转换还有其它一些功能。首先,话题的改变可能带来语码转换。吴素云在向女儿解释犹太麻将与中国麻将的区别时,首先选择英语解释,当说到中国麻将时,则转而使用汉语(22-23)。汉语在某些场合还具有排他的作用,如吴素云和女儿一起置办年货时为了回避供应商,就改用汉语(225)。另外,英语成为第一代移民之间感情交流的特殊方式。如龚琳达在与丈夫结婚前,就故意将用英语写成的求爱内容的纸条给对方,并让对方翻译告诉她(302)。使用双方都不十分熟悉的语言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尴尬。

### 2.3 语码转换及语码选择的理论阐述

我们可以用标记模式解释小说中的语码转换及语码选择。首先,应该认识到两代移民对哪种语言代表无标记的语码选择有着不同的理解。对第一代移民母亲而言,汉语是 Myers-Scotton (1993) 所言的主体语言(matrix language),因此在多数情况下属于无标记选择;而对第二代移民女儿来说,英语总是代表无标记选择。小说中所提到的语码选择很多时候属于一种有标记的选择,交际者都意欲通过语码转换来实现特定的交际目的。如母亲们在发脾气时使用汉语,是为了达到暂时扩大与女儿的心理距离,以示对女儿行为的不满;在讲述母辈的故事时,讲述者通常选择汉语,以便女儿们认识到那是关于她们故国的故事;而在有外人在场的时候选择汉语则为了排他。另外,有时语码转换本身是一种无标记的选择。如第一代移民在打麻将时英汉混用;母女交际中突然出现少量汉语。

虽然有学者认为 Giles 等的“适应论”(Speech Accommodation Theory)可以用来解释语码转换现象,但我们认为 Le Page (1984) 等的“身份行为理论”(Acts of Identity)能更好地解释小说中的一些语码转换现象。在对两种语言均具备一定能力时,说话人并不是从听话人角度出发,而是根据自己想表达的意义和交际意图选择语码。第一代移民与第二代移民交流时,如果是遵循适应论,前者通常会选择后者更熟悉的英语,而后者也会选择前者更熟悉的汉语。但在两代华裔移民的交流中,情况正好相反。第一代移民选择汉语,是因为将自己更多地认同为中国人。对他们而言,英语表现出的是“他者”。在对话中选择汉语,也是突出其文化身份的一种方式。而第二代移民选择英语,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就是美国人,汉语成为他者的象征。这就是身份行为理论所表现的典型情况。

虽然 Myers-Scotton 认为 Fishman 的域理论无法充分解释语码转换现象,但笔者认为,该理论其实可以很好地解释小说中的语码选择。英语和汉语在第一代移民生活中属于两个不同的域(domain),各自在属于自己的域中出现。在家中、与其他中国人的交往中使用汉语的时候较多,而在与“外国人”的交往中只能使用英语。当然,两者也有交叉,如在麻将桌上。这说明第一代移民对自己文化身份的认知有双重性。他们将汉语视为母语,将中国文化视为本民族文化,但由于长年生活在美国,他们也渐渐认识到并接受英语和美国文化在其生活中的重要性。因此,他们能够较为自如地根据语境做出正确的语码选择。

而对第二代移民而言,情况要复杂很多。LI (1994) 指出,交际对象的不同对移民的语码选择影响很大。在国外出生、长大的移民虽然很少对同族同辈人讲汉语,但在家庭以及自己所处的少数族裔言语社团中,他们并不会完全抛弃汉语的使用。在与父母和父母辈的其他移民交流时,作为第二代移民的子女和年轻人有时也会使用汉语,而且某些思维方式也是中国式的。如吴精美称呼其他来家里打麻将的人为“auntie”、“uncle”,而不是美式的某某太太、某某先生(15)。不过,第二代移民的汉语水平并不高,许露丝、丽娜·圣克莱尔都读不懂汉语。另外,由于对汉语所隐含的文化了解太少,女儿们“对自己母亲带至美国的准则和企望一无所知,而且漠不关心”(31)。再加上汉语在美国社会处于边缘地位,这决定了他们更少使用汉语。

虽然第二代移民常对汉语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中国文化表示轻蔑和不屑,但随着中国的发展和全球文化多元化的趋势,这种现象有所改观。吴精美并不介意其他人叫她“精美”还是“琼”(June),因为在她看

来在美国出生的华裔用中国名字，倒变成时髦之举了（26）。对汉语态度的微妙变化生动反映了他们对其华裔身份的微妙态度变化。以前排斥汉语、青睐英语，是因为他们渴望与美国主流社会认同，现在他们更多地接受汉语，说明他们比以前更愿意正视自己身为华裔这一特殊身份。

从上述不同场合下的语言选择我们能较好地看出两代移民的不同语言态度。

### 3. 《喜福会》反映出语言态度的不同

第一代移民对主流社会的归属感较差，这种归属感的缺乏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语言选择和语言态度。丽娜·圣克莱尔在对女儿发脾气时甚至说“你们这些美国人”（105）。许安梅对女儿与美国白人交友表示不满，因为他是个“外国人”，而女儿却表示“我也是个美国人”（124）。薇弗莱·龚的母亲也反对女儿与美国人结婚。他们更亲近中国人，能在工作场所听见有人说汉语就会不觉地亲近一些，如龚琳达因另外一位工友也说国语而感到高兴。她们在工作场合也较多同时使用两种语言（299）。讲同一种语言让他们体会到一种共同的归属感，弥漫于第一代移民中对母语的强烈情感倾斜是具有普遍性的（参见 LI, 1994）。

当然，《喜福会》中四位母亲对待英语和汉语的态度表现出一定的矛盾心情。在赴美途中，母亲们就已认识到英语能力在美国社会的重要性。虽然她们已无力学好标准英语，但她们深信女儿们将能娴熟地掌握标准英语，并因此获得相应的社会地位：“在那里将没有人看不起她，因为我要让她说完美的美式英语”（4）。迟暮之时，她们仍希望能将自己的故事用完美的美式英语告诉女儿。虽然她们在感情上更倾向于说汉语，但为了在美国社会更好地生存，却不得不鼓励孩子们说英语；为了向女儿们传递自己所承载的中国文化，也不得不经常使用英语这一媒介。

与母亲们不同，女儿们在面对家庭内的中国文化（弱势文化）和家庭外的美国文化（强势文化）时，自然选择了后者，并有强烈的意愿融入强势文化，成为其一员。这在语言选择上表现尤为突出。因而，她们不耐烦与自己的母亲用汉语交谈，很少讲汉语去适应母亲。通常是母亲用结结巴巴的英语去迎合女儿，向她们解释，而女儿们又嘲笑她们的英语，笑她们脑子不大灵活（31）。这表明强势与弱势文化发生冲突时，通常以牺牲弱势文化为代价，而交流时语言的选择更是表明了这一点。母女对两种语码表现出不同的态度，说明语码选择是移民表达文化社会身份的直观手段之一，虽然有时可能是无意识的选择。

### 4. 结 语

从对《喜福会》中语码选择以及语码转换的分析可以看出，第一代与第二代移民对汉、英两种语言表露出不同的态度，对各自代表的文化有着不同的归属感。第一代移民（母亲们）使用汉语的时候较多，并能在不同场合通过选择汉语，表达不同的交际意图，对汉语所代表的中国文化有强烈的归属感。而第二代移民（女儿们）却更多地使用英语，这不仅是因为她们的汉语水平远不及英语，更为深层的原因是她们试图借此回避或拒绝认同汉语所代表的弱势文化，而更多地寻求与英语所代表的美国主流白人文化认同。

#### 参考文献：

- Franceschini, Rita. 1998. Code-switching and the notion of code in linguistics. *Code-switching in conversation: Language, interaction and identity*. In: Auer, P. (Ed.). London: Routledge.
- Giles, Howard, Justine Coupland & Nikolas Coupland. (Eds.). 1991. *Contexts of accommodation: Developments in applied sociolinguis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umperz, J. 1982. *Discourse strategies*. CUP.
- Le Page, R. B. & Tabouret-Keller, A. 1985. *Acts of identity: Creole-based approaches to language and ethnicity*. CUP.
- LI, W. 1994. *Three generations, two languages, one family: Language choice and language shift in a Chinese community in Britain*.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Myers-Scotton, C. 1993. *Social motivations for codeswitching: Evidence from Africa*. NY: OUP.

Tan, Amy. 1989. *The joy luck club*. NY: Ivy Books.

李经纬. 从斯科顿的标记模式看语码转换研究的新进展[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2 (2): 12-16.

李经纬. 语码转换与称呼语的标记功能[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1999 (2): 8-10.

## Language attitude reflected in the code choices by American Chinese immigrants in *The joy luck club*

CHEN Chun-hua, HU Ya-min

**Abstract:** In Amy Tan's *The joy luck club*, many cases of code-switching in the daily lives of the Chinese immigrants manifest different attitudes of the first- and second-generation immigrants towards the languages of Chinese and English, which signifies the two generations' different tendencies of recognition of their social identities.

**Keywords:** *The joy luck club*; code-switching; language attitude; social identity; the Markedness Model

(Edited by Stella, Doris and Jessica)